

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 著
罗伊·亚·麦德维杰夫 译
钱 诚

谁是疯子？



群众出版社

谁是疯子？

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 著
罗伊·亚·麦德维杰夫

钱 诚 译

(内部发行)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内部发行)

谁 是 疯 子 ？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88 印张 122 千字
1979年11月第1版 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

内部发行 定价：0.56 元

译 者 的 话

摆在读者面前的不是一部小说，它是两位作者本人的一段经历。本书所叙述的事件发生在距莫斯科不远的一个小城市。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作者之一，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科学家若列斯·麦德维杰夫突然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另一作者，受害人的孪生兄弟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莫斯科等处展开了营救活动。此事很快为西方记者获悉，美、英、法等国的报纸、电台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谴责利用精神病院进行政治迫害。书中反映了今日苏联知识界精神面貌的某些特点以及苏联社会生活的若干侧面。

两位作者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中有代表性的人物。若列斯·麦德维杰夫是生物学博士，从事遗传学和老年学的研究。他所著《李森科的反遗传学理论给苏联农业造成的危害》及《李森科兴衰史》等曾在国外发表。他于一九七二年离苏移居国外。一九七三年八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鉴于他“进行了侮辱苏联公民称号的活动”，取消了他的苏联国籍。罗伊·麦德维杰夫是莫斯科的一个教育工作者，历史学家。他的长篇著作《让历史作出判决》和《论社会主义民主》等也曾在西方发表。

在本书最后一部分，作者结合着对这一事件的分析，对苏联的法制、社会主义民主、民主集中原则与少数派的权利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现行政治体制中的缺点并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的东西。这些缺点是能够而且应该在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范围内得到克服

的。作者声称他所指责的并不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或苏维埃社会制度和苏维埃国家制度，而是指那种管理社会的具体形式，这一形式在许多方面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和苏维埃政权的原则的。

最后，作者以二十年代的幻想小说《我们》和六十年代的幻想小说《研究院》的内容简介结束全书，表明了对于利用精神病院进行政治迫害的强烈不满。作者通过事实表明若列斯·麦德维杰夫不是疯人，因此把书名定为《谁是疯子？》

今年八、九月间，我哥哥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写了一篇特写，叙述某些无疑是公众所关心的事件。我也参与了这些事件并曾随时把有关消息通知我们共同的熟人和朋友们，所以，在我当时的笔记里也录下了这件事的许多细节。这些细节恰好是我哥哥的记述中所没有的，增添这些内容可以使这个事件的概貌显得完整得多。因此，我就作了一个尝试，把下面两种材料剪辑起来：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叙述他所目睹和亲身感受的情况，他的叙述在某些地方自然就中断了，这时我就把自己的增补加进去。为了避免重复，我在个别地方对我哥哥的特写略有删节。

罗伊·亚·麦德维杰夫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日

有人曾经请求我把下面叙述的事情忘掉。我同意了，但是我提出了一定的条件。现在，主要事件发生后已经过了三个月，很明显，对方并不想履行他们的诺言。这样也就使我有选择自由。在这一情况下，选择是不会成为难题的——只要不隐瞒社会公众感兴趣的事就行了。

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

目 录

- 一、排“戏” (1)
- 二、开始行动..... (13)
- 三、斗争的第一周..... (27)
- 四、反其道而行的医学..... (69)
- 五、斗争仍在继续..... (89)
- 六、精神病讹诈..... (111)
- 七、若列斯获释后的头几天..... (125)
- 八、没有自由的“自由”..... (132)
- 九、心理适应化还是民主化? (147)
- 不要心理适应, 要民主化! (164)

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

一、排“戏”

一九七〇年四月——五月

要把本书所叙述的事件讲清楚，我得从一个序幕谈起，它发生在这件事的两个半月以前。二月底，有一位朋友觉得必须通知我：他的一位同事，科学工作者，物理数学博士的家遭到了克格勃机关的搜查。搜查时没收了他的一些稿件，即所谓的《私下出版物》^①。我的朋友感到很不安，他告诉我，没收的稿件里面可能还有我写的《科学家之间的国际合作与国界》一书的手稿，那是我的朋友拿给他那位同事去随便看看的。

虽然我同那位被搜查的人并不相识，也没有同意过把手稿转交给他，但是我也没有因为克格勃可能了解到我手稿的内容而感到不安。被没收的那份手稿不能算是《私下出版物》，因为那上面有作者的亲笔改动和署名。况且，我的那篇著作是早在一九六八年就写好了的，也不是什么秘密。那本书里所谈的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科学研究一体化的问题，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它正引起许多国家的科学家们的广泛讨论。我在一九六八年提出的只是一个有待商榷的初步方案，它还没有达到可以出版的条件。近两年来我一直在和同事们

^①《Самиздат》（“萨密兹达特”）——“私下出版物”，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自己设法打印或油印的一些不公开发行的出版物。——译者。

讨论这本著作，并不断作一些恰当的修改。一九六八年底，曾有人建议我把其中的一章略加润色，先在莫斯科的刊物上发表，但是我认为还为时过早。

在两年的时间里，我的手稿已经由很多人过目了，尽管如此，由于我采取了某些措施，它并没有成为《私下出版物》的对象。人们看到的手稿的复制件，都是由我署名并亲自修改过的，而且复制件为数不多，无论如何，总没有超过预备进行专业性讨论所必需的份数。也许是编印《私下出版物》的人们根本没有打算把这本著作投进不断扩散的连锁反应中去，或者是该书的最初几份复制稿没有引起“群众评论界”的足够重视，要么就是因为所讨论的题材专业性太强而没有具备引起连锁反应的条件，总之，它并没有被无控制地扩散。

我原计划到一九七一年再认真地修改这份手稿，目前只是在一点一滴地收集补充材料，听取意见和建议。我那本书，就其性质而言，并不是仅仅为了科学家或者某个特别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阶层而写的。作为作者，我也很想了解党内和政界对它的反映，我甚至认为同克格勃人员座谈一下其中的某些章节也不无裨益。到时候，国家书刊保密检查总局，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在书刊方面代表党和国家利益的机关，本来是可以合法途径拿到那本书的书稿的，而且有机会对其内容提出自己的权威意见。可是，现在呢，我只好等待召见，以便去解释，我那未完成的著作手稿怎么会同其它被没收的东西弄到一起去的。

可是，整个三月都平安地过去了。可以设想是上述手稿没有引起检查人员的特别注意。不过倒也没有把手稿退还给

我。到了四月，我几乎把这件事忘掉了，尤其是因为当时又有另外一些问题使我感到更大的不安。

大约是四月八、九日吧，我突然接到奥布宁斯克市苏维埃打来的电话，通知我：市苏维埃主席尼娜·彼得罗夫娜·安东年科有急事想见我。我自然要问一下同我谈什么问题。对此，女秘书只回答说是谈重要的事情。我很快地赶到了市苏维埃，市苏维埃主席立刻就接见了。我在奥布宁斯克市已经住了七年，但过去还从来没有进过这间办公室。

什么事情使得尼·彼·安东年科如此急迫地要召见我呢？原来是关于我的大儿子，十年级的学生萨沙的品行问题。近两三年来，这孩子确实没有给老师和家长带来多少安慰。自从年龄上进入所谓“过度期”以来，也就是从八年级开始，他的学习成绩明显下降，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他的表现都不如从前了。他学会了一套在国外称之为“颓废派”的作风。学校和家长对他采取了某些教育和强制性措施，而他对此的反应则是在一九六八年夏天，八年级考试刚刚结束之后，私自逃到南方去了。他在海滨住了两个星期，靠变卖一部分他收藏的邮票维持生活。克里米亚的民警抓了不少这样未成年的“逃亡者”，然后再通过儿童收容所把他们交还给他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子自然也没有逃脱这种命运。可是，当他第二次逃跑并同样被送回之后，我们就只好去找精神科医生给他检查一下，听听医生的意见；当父母发现自己孩子的性格起了奇怪的变化而又找不到其原因时，这样作也是很自然的。

精神科医生检查的结果并没有发现我儿子心理上有什么可以影响智力的实质性变化。根据医生的解释来看，这只是

由于在意志力量发育不足的情况下的激素性早熟(催速)所引起的。因此,他的情绪不能得到制动因素的有效控制。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正确的教育下,“失去控制的欲望”之类的现象是会消除的。

尼·彼·安东年科批评了我这个作父亲的,并且在怎样进行教育方面向我提了些建议;她还说起了苏共奥布宁斯克市委负责意识形态问题的书记的儿子是多么不幸,想借此引起我的警惕。那位书记的儿子不久前由于犯罪行为同一批少年一起被判刑了。之后安东年科告诉我:明天卡卢加州教育局的沃夫科同志还要请我去谈谈我儿子的问题。

“这就是来信,您可以自己看看。”安东年科说着递给我一封用公文纸打好的信。

州教育局的信是写给奥布宁斯克市苏维埃主席的。信中要求她安排若·亚·麦德维杰夫明天上午十一点半到卡卢加州教育局去谈他儿子亚历山大^①的事。但是不巧,那天我已经有安排了:莫斯科的医学科学院要找我去谈我的申诉问题,我因为被非法解除实验室主任职务问题提出申诉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我对安东年科讲明了这个情况,并请她给我安排另外的时间去卡卢加。安东年科立刻挂电话同卡卢加教育局联系,但那边似乎仍然坚持要求我明天去。这样一来,我就只好同意了,不过,我告诉他们:我请妻子代我去卡卢加。我的这个决定不知道为什么非常不合市苏维埃主席的口味。于是她便努力说服我:母亲么,毕竟是母亲;州教育局就是要想跟孩子的父亲谈谈。我向她解释说,孩子母亲了解孩子的一

^①亚历山大是本名,萨沙是亚历山大的爱称。——译者。

切问题，她是个科学工作者，还担任过工会委员会的儿童委员会委员。但是安东年科还是坚持要作父亲的去。对家长之一采取这种歧视态度，实在令人费解。于是我又问她，还有没有别的家长被叫到卡卢加州教育局去谈话。回答是：奥布宁斯克市只请了我一个人。这更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因为我儿子的学习成绩在他们班里并不是最差的，更不必说在全校和全市了。对于这一点，安东年科解释说，现在州教育局首先关心的是那些有相当社会地位的家长们的子女。这种解释简直叫我啼笑皆非了，因为我当时的“社会地位”实在并不令人羡慕——我实际上就是个失业者。

那次谈话最后是以妥协而结束的。我答应：如果有可能改期去苏联医学科学院，我就尽量争取去卡卢加。离开市苏维埃后，我马上去找中学校长，想了解一下州教育局邀我去的原因。原来，卡卢加州教育局根本没有人向校长询问过我儿子的情况。这样，叫我到卡卢加去就更显得奇怪了。为什么不通过学校叫我，而通过市苏维埃主席呢？为什么一定要见学生的父亲而不见他的母亲呢？我儿子已经十七岁了，为什么不让他也去？但是为了不让州教育局的人白白等我，我便给沃夫科拍了个电报，讲明因为莫斯科要我去，所以我就不能去卡卢加了。

那次在市苏维埃谈话之后，大约过了十天，那位沃夫科亲自给我打来电话了。她请我第二天到州教育局去。我们电话谈话的内容大致如下：

我：我看不出有什么重大理由非得去卡卢加谈我儿子的问题不可。校长和奥布宁斯克市教育局都没有找过我。再说，这个学年还有一个月就要结束，我儿子一毕业，就同州

教育系统没有任何关系了。现在我儿子只有一个任务：修完中学课程。学校的老师们认为我们的萨沙虽说学习成绩不特别出色，但也能毕业，能拿到文凭。你们的这种担心使我很难理解。

沃夫科：我们确实有重要理由要同您谈一下。这也是为了您好。我想，您总该关心您儿子的前途吧。

我：您的理由是什么呢？能不能在电话里简单地说一下？卡卢加又不是近处，可是谈话也许只要十分钟就够了。

沃夫科：十分钟可不够咱们谈的。我们州教育局的长途电话经费很有限，所以还是请您来一趟吧！

我：那么您把您的电话号码告诉我，然后把电话挂上。我再给您打。这样我们可以随便谈多久，由我付电话费。无论如何，您哪怕先说一下到底是什么事情也好。有些事情还得先考虑一下么。

沃夫科：我们对您儿子的某些行为感到不安，州教育局已经发现了一些迹象。我们认为不得不请精神科医生给他检查一下。我们教育局可以把卡卢加精神病防治所的主任列兹年科同志请来，他是个很有经验的精神科医生。他会和您详细谈谈您儿子的问题，会给您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现在我们对一些难以教育的青少年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效果很好。

接下去同沃夫科的谈话就更没有什么意思了。我告诉她：“关于我儿子的行为，我们早已征求过精神科医生的意见。目前毕业考试在即，在这种时候带儿子去找精神科大夫，或者到卡卢加去听取精神病学方面的意见实在没有多大意义。”

为什么不止一次地令人奇怪地要求我去卡卢加，现在已

经很清楚了。原来不是要对儿子，而是打算对他父亲进行一次精神病鉴定。正因为这样，州教育局才不想和母亲打交道。某些人的活动引起了当局的不满，但毕竟没有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于是就对这样的人突然进行精神病鉴定。这种事人们已经早有所闻了。通常进行这种鉴定的办法，是把人召到军事委员部去进行定期身体检查。不久前，我在莫斯科的一位熟人就被人们搞过这样一次精神病鉴定。他由于丢失了几封寄往国外的挂号信曾长期同国际邮政总局闹纠纷。当他向法院提出控诉之后不久，他就收到了军事委员部的通知，要他到身体检查小组去进行检查，他去后才知道那是个精神病鉴定小组。我们还知道另外一件事，就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从军事委员部直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有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如波·格·格里戈连科，伊·雅希莫维奇等，也已经被送进了精神病院，那是因为他们写的政论文章在国外发表了。我还听说过，有些恐怖政策的受害者写了一些以“劳改营”为题材的作品，于是便有人谨慎地试图把这类作品说成是心理变态的产物。有人则在某些讨论意识形态的会议上说，不少作者之所以选择“镇压”和“劳改营”这类题材，是因为他们对过去所受的痛苦“始终耿耿于怀”。

看来，也正在为我排演这样一场精神病题材的“戏”。不过，由于对我来说由军事委员部出面并不合适，所以就有人想了个好主意，召我到州教育局去：家长对孩子的感情嘛！这当然是找人谈话的很合适的理由。

我的这种怀疑很快就加深了。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又通知我到市苏维埃去见安东年科。不过这次说是谈我本人的工作问题。因为我失业的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当局有合法的权

利要求我去作出解释。

第二天，我按指定时间来到市苏维埃，可是安东年科的办公室里却不只她一个人。还有一个陌生的男人跟她并排坐在会议桌旁。安东年科向我介绍说，另一位是州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这位同志似乎也有些关于我儿子的问题要问我。然而并没有告诉我那个人姓什么。

关于我的工作安排问题没有谈多久。安东年科向我宣读了一个新规定中的若干项目，那里提到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对付那些逃避工作的人。读完后，她要求我解释这么长时间处于“集体之外”的原因。我尽量向她说明自己不属于那些逃避工作的人们之例。是研究所非法地解除了我的职务，同时违犯了关于职务空缺候选人考核遴选的条例。我已多次请求苏联医学科学院和奥布宁斯克市的检察机关恢复我的职务，但至今毫无结果。而且大约有一年之久研究所的领导不发给我书面鉴定，使我无法参加其它学术机关的职务考核遴选。只是在检察机关和医学科学院发出三次指示之后，研究所才给了我一份含有许多不实之词的鉴定。尽管这样，我还是马上就把材料寄到莫斯科的医学遗传学研究所去，以便参加那里的生物化学遗传问题一级研究员职务的考核遴选，现在正在等待结果。因此，不能把我列入逃避工作的人员之例。如果市苏维埃能帮助我，比如说，在奥布宁斯克的唯一一所研究所内恢复工作的话，我将以感激的心情接受这种帮助。

接着就谈起我儿子的问题了。起初一段时间，州教育局的那位代表还保持了一个教育工作者所应有的专业水平，但谈到后来他就不知不觉地暴露出他的真正专业了。

“您好象还有一个小儿子，”他问道，“他的学习怎么

样？对他的表现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吗？”

我回答说，我的小儿子学习很好，对他在家里和在学校里的表现我们都很满意。

“我听说您还有个孪生兄弟，他有没有小孩？”

“我弟弟有一个儿子，快念完五年级了。”

“请原谅，我可能太好奇了。”这位州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不甘心就此罢休，“您弟弟的儿子学习好吗？您知道，孪生兄弟常常会有共同的关于孩子的问题。”

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很清楚地说明，坐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而是一个精神科医生，他是在谨慎地试图进行所谓“家庭方面”的和“孪生兄弟方面”的精神病学分析。

此事过后不久，我又听到了一个值得警惕的消息：听说有人曾到我一九六九年三月之前工作过的那个单位——医学放射学研究所——去过，并且“秘密地”向一些同事打听过我原来在实验室的情况，那人特别感兴趣的是我是否和同事们发生过什么冲突。

到了五月初，奥布宁斯克市精神病防治所主任尤·弗·基柳申又请我去谈我儿子的事。但是，他的这次邀请并没有引起我的担心，因为过去为了我儿子性格变化的问题我就是去征求过他的意见。他给我出过一些主意，因此，他有权继续观察孩子的发展情况。我早就认识基柳申，那还是在他当本地的精神科医生之前呢。他妻子原来和我在一个部门工作，她哥哥在莫斯科，跟我很熟。我甚至还想过要同基柳申推心置腹地谈谈有关精神病学的若干法律方面的问题。

奥布宁斯克市精神病防治所包括一个门诊部和有25—30